

公共消费能否牵动居民消费*

姚 鹏 王雨彤

内容提要:消费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更是未来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提振居民消费不仅需要从需求侧激发居民消费意愿,也需要从供给侧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基于此,本文选取2015—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采购能够“挤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意愿,从需求侧激励居民消费。同时,政府采购能够从供给侧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供给质量,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其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平均工资,从而提振居民消费。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采购对于高收入地区、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及西部地区、低收入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并且由中小型企业获得的政府采购订单更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采购能够在满足政府需求的同时满足其他消费主体的需求,实现居民消费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有效衔接。本文研究对于提振居民消费,释放国内市场需求,推动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政府采购 居民消费 消费意愿 供给质量

作者简介:姚 鹏,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276826;

王雨彤,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100142。

中图分类号:F126,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25)05-0040-17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与此同时,国际竞争格局加速演进,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经济增速放缓。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导向。^①“十四五”规划围绕“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系统提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水资源刚性约束驱动黄河流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路径与对策研究”(23BJL117)。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王雨彤电子邮箱:bfmyqsm@126.com。

^①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的演讲。

三个关键路径。其中,“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有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推动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支撑。

我国内需由居民消费、公共消费与投资共同组成,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高投资和低消费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外贸依存度高等风险逐渐显现(王立国、赵婉舒,2019)。因此,当前扩大内需无法再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呈显著下降趋势,虽在2010年后有所反弹,但该比重在2005年后始终低于40%,与20世纪90年代相差较大,具有较大上升潜力。与之相对,2005年后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始终高于40%,但2010年后该比重上升态势减缓,并伴有微弱下降现象(见图1)。由此可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日益疲弱,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仍具有较大潜力。在外部经济冲击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居民消费既是内需的主体,亦是构建完整内需体系的关键性基础,依靠居民消费作为内需增长的主要引擎,有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提高经济韧性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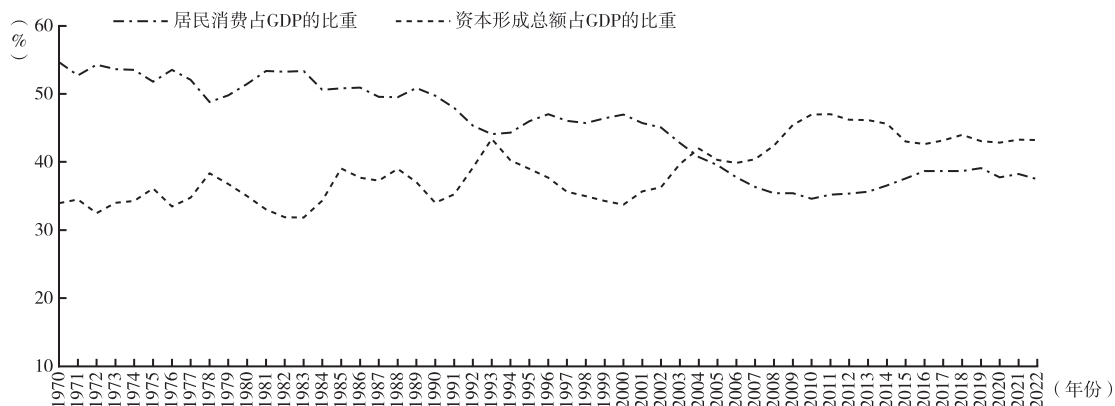


图1 居民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那么,造成居民消费占比日趋下降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从消费行为的需求侧(居民)来看,受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人口老龄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较大的压力,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不安全感,抑制居民消费意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8.12%,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且居民消费倾向仅为65.89%,而美国同时期的平均消费倾向为90%左右。此外,部分研究测算结果表明:在相似的发展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倾向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约低20个百分点(王蕴等,2022)。由此可知,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已成为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从消费行为的供给侧(企业)来看,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加,居民消费日趋多元化、个性化,因此提振居民消费不仅需要确保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数量,还需实现供需之间的有效匹配。《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明确指出,我国部分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尚不能满足群众日益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从中国居民消费变化趋势看,2000—2016年中国最终居民进口消费品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平均为42.47%。与之相比,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销售额占工业产业销售总额的比重从未超过23%。因此,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

的背景下,通过持续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产品质量来填补“供给缺口”,从而减少需求外溢,对于中国经济实现长期、高质量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孙早、许薛璐,2018)。综上所述,我国市场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但居民消费需求较低,且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选择了国外产品,导致居民消费面临“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双向不足”的现实问题,使得我国庞大的内需市场难以发挥其重要作用。

针对居民消费问题,国内外学者从“居民自身”的预防性储蓄、文化习惯、家庭偏好、社会网络、性别比例、住房的财富效应以及收入差距等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解释(Wei和Zhang,2011;杜莉、罗俊良,2017;李树、于文超,2020)。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出发,研究产业技术创新对居民消费水平及其消费结构的影响(孙早、许薛璐,2018)。鲜有文章将影响居民消费的“供给”与“需求”问题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探寻实现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对接、转化的关键节点。202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扩大居民消费,合理增加公共消费”。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减少限制性措施,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这些重大决策部署为加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充分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提供了方向性指引:着力扩大内需,既要扩大居民消费,也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费。而政府采购^①作为政府运用市场机制与企业建立经济联系的公共消费方式,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双重特征,充分体现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更好结合(窦超等,2020)。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作为最大的购买主体,能够通过采购行为撬动消费市场,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目标。一方面,政府采购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其作为公共消费的一部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居民消费风险,增强居民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潘彬等,2006),激发其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采购的“市场性”特征,能够提振企业创新动力(Chen等,2022),从而提高产品供给质量,实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有效衔接。

2003—2021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由0.17万亿元增至3.64万亿元。2021年,政府采购总额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比重分别为10.1%和3.2%。随着政府采购范围与规模的不断扩大,政府采购承担了越来越广泛的经济功能。但现有关于政府采购的相关文献,大多集中于探讨采购决策对企业发展、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影响(Goldman,2020;武威、刘国平,2021),少有文献关注于政府采购作为公共部门的消费行为对居民部门消费是否具备引领作用,即发挥“四两拨千斤”之效,通过政府采购这一占GDP比重不足4%的公共消费能否引动居民消费?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利用多组微观数据,探究政府采购行为下,政府、企业与居民间的影响关系,为进一步释放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供新视角。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方面。第一,在理论价值方面,丰富了关于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理论研究。在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中,影响消费的内在核心要素主要为居民收入和消费者偏好。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针对居民消费的研究也逐渐转向由供给质量提高所带来的消费效率提升、消费结构转变等内容。但鲜有研究同时基于居民消费的“需求”和“供给”双重视角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本文在厘清居民消费现状的基础上,将影响居民消费的“需求”与“供给”问题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聚焦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和“市场性”双重特征,探寻实现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对接、转化的关键节点。第二,在实证策略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究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单一的微观家庭或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指出,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者宏观区域视角研究居民消费问题。为此,本文手工整理并匹配了城市宏观数据、政府采购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全面考察政府采购行为下政府、企业与居民间的影响关系。第三,在政策启示方面,为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提振居民消费提供微观经验证据。政府采购作为政府与企业建立经济联系的公共消费方式,与企业关系较为密切,故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探讨政府采购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仅有少数文献考察了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社会的影响,也鲜有文章关注政府采购作为公共部门的消费行为,对居民部门消费是否具备引领作用。基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与路径机制,为进一步挖掘内需潜力,刺激消费形成持续增长点,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提振居民消费已成为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应有之义。但我国居民消费仍存在“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双向不足”的问题,致使消费行为两侧难以实现有效协调,制约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而政府采购兼具“公共性”与“市场性”的双重特征,能够在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的同时提升企业供给质量,破解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矛盾,提振居民消费。

(一)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需求侧的影响

1.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意愿的影响

从预期角度来看,政府采购有利于缓解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Feldstein, 1974),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当前我国虽具有巨大的消费市场,但由于经济下行的影响,消费受到一定抑制,居民的储蓄愿望不断增强,对未来经济和家庭收入不确定性的担忧已然成为制约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政府采购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宏观调控优势。通常而言,政府支出效率越高,制度及政策的执行越高效,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进而使得民众产生良好预期(徐舒等, 2023),提高其消费意愿,将更多收入投入满足当下的物质、精神等活动当中,改善边际消费倾向,增加当期消费。同时,政府作为采购方与企业等市场主体进行交易,通过对供应商的资质审核和监督,能够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可信度(Chen等, 2022),为市场树立信任标杆,缓解消费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可以间接增强消费者对市场环境的信心,减少对消费风险的担忧,从而激励居民消费行为。

2. 政府采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的增长源于收入增长。而公共消费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现有文献普遍认为,公共消费能够通过居民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邵明波、胡志平, 2021),但现有研究对公共消费与居民可支配收入之间关系仍存在“挤入”和“挤出”两种对立的观点。

第一,政府采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挤入效应”。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来刺激经济增长,提高全民收入和就业水平,从而拉动消费和投资(Bouakez 和 Rebei, 2007),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间呈现“互补”关系。根据乘数-加速数原理,政府采购作为社会最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模的扩张意味着总需求的增加。随着总需求的提高,经济中的生产活动和居民收入水平也在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得以显著增强(邵明波、胡志平, 2021)。另一方面,政府采购有助于降低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成本,增加其可用于其他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具体而言,政府采购可

以通过市场机制作用,把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力量承担,^①从而降低居民在服务性消费方面的经济负担,提高其可支配收入与消费能力(阎坤、王进杰,2003)。

第二,政府采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挤出效应”。从新古典主义的角度,公共消费需依靠发债或税收获得资金,根据李嘉图等价定理与永久性收入假说,出于对未来征税的预期,居民将减少当期消费以应对可能的收入波动。具体而言,不论是公共消费还是政府采购,其财政资金主要依靠征税或发债获得(Boehm, 2020)。在这种情况下,若采取征税方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直接受到影响,消费能力随之下降;而如果选择发行债券,尽管短期内可能不会显著减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但债务的本质是对未来收入的透支,即未来的偿债需求必然转化为额外的税收负担,理性消费者预期未来税收负担增加,将减少当期消费以储备资金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无论是通过征税还是发债,政府采购都将对居民消费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挤压(Dawood和Francois, 2018)。

但政府采购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节约财政性资金(刘京焕等, 2013)。从政府采购的运行模式来看,在对财政支出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下,各级采购主体首先在市场公开发布采购招标信息,随后从众多供应商中选择质量优秀且价格合理商品、工程或服务,简化了资金流过程,有效降低采购成本(赵福军, 2007)。而且由集中采购所形成的规模效应使得政府能够通过批量购买的方式降低单位商品或服务的成本。这一模式不仅提高了财政支出效率,也使得有限的财政资金得以更为高效地分配和使用,削弱采购支出对税收或发债的依赖。因此,与一般直接的公共消费方式相比,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透明的竞争性招标和精细化管理,有效避免公共资金的浪费和不当支出,提高政府采购的支出效率(杨方方、陈少威, 2014),从而降低税费负担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凸显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挤入”作用。

(二)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的影响

企业作为市场中商品或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不仅在政府采购中扮演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也直接关系到居民消费的供给侧,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政府采购作为公众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重要媒介,能够与企业产生交易契约关系,引导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优化供给质量。同时,政府采购规模庞大,有助于推动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而稳定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收入(张国胜、吴晶, 2019)。

1. 政府采购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根据需求引致创新理论,企业的创新活动源于市场需求(Schmookler, 1962)。当企业预期市场需求足够大时,创新所带来的潜在收益能够覆盖高昂的研发成本,甚至为企业带来超额利润。预期收益的提高有助于增强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动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来开发更具竞争力、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形成良性的创新投入循环。政府采购作为影响创新方向和速度的重要政策工具,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为企业生产提供明确的市场需求(Bleda和Chicot, 2020),有助于企业更有针对性地进行研发投入,缓解企业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加快技术成果的转化,进而推动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切实提高市场供给质量。同时,政府采购过程中,通常会对企业进行严格的评估和审核,能够向金融机构传递企业的信用和价值信息,为企业的商誉和信用背书(田利辉、关欣, 2023),提高公司透明度,缓解金融机构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贷支持(Goldman, 2020)。由此,政府采购能够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降低企业运营的财务风险,使企业有足够的资金投入技术创新之中,

^① 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国家工商总局印发《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暂行)》。

切实提高企业的供给质量、拓展产品的种类和多样性,以满足居民个性化、多元化消费需求,从供给侧带动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2.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的溢出效应

政府采购能够促使企业提高雇佣规模与工资水平,为居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与收入。一方面,政府机关作为采购主体拥有日益强大的购买力,能够为企业带来规模可观且风险较小的经济收益,已成为市场上重要的客户群体。因此,获取政府采购订单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这种大量而稳定的市场需求推动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用工需求,从而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与工资(Holden和Sparrman,2018),带动居民部门整体消费水平提升。另一方面,政府客户注重采购活动的社会效益和示范追随效应。这意味着政府在选择供应商时不仅考虑商业利益,还将考虑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因此,政府采购合同的稳定性和长期性,促使企业在制定战略时更加注重社会责任的履行。拥有政府客户的企业将更加积极地响应政府号召(王伊攀、朱晓满,2022),通过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的工资福利水平,增强企业和社会中的形象和影响力,从而提高企业获得更多订单和市场的机会。

假设1:政府采购能够增强居民消费意愿,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激励居民消费行为。

假设2:政府采购能够节约财政资金,进而通过“挤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提振居民消费。

假设3:政府采购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以满足居民消费的多元化需求。

假设4:政府采购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能够促使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平均工资,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扩张。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市级居民消费数据以及由政府采购合同信息^①所汇集形成的政府采购规模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并将政府采购规模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匹配,进一步探究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的微观作用机制。2015年,我国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明确规定,政府采购项目信息需在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指定的媒体上发布。故2015年之前的采购公告存在着大量的样本缺失。相比之下,2015年及之后的政府采购合同数据更加翔实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选取2015—2019年作为实证研究的年份区间。

1. 政府采购合同与地级市居民消费数据匹配

本文利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合同公告查询”系统,对采购合同的名称、金额、供应商、采购人、所属地区等信息进行收集整理。由于采购合同中“所属地区”信息存在大量缺失,本文以百度地图为基础,利用“采购人名称”“所属地区”等指标,通过地理编码的方式获取政府采购合同所在省市等地区信息。据此,将每年各市辖区内全部政府采购合同的数量、金额汇总在地级市层面(包括市级、区县级部门所发布的合同),并形成政府采购规模数据,进而将政府采购规模数据与居民消费数据进行匹配,其中居民消费数据及人均GDP等控制变量信息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① 本文使用了2015—2019年全部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其采购主体涵盖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采购内容包括货物、工程和服务。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地方统计年鉴。

2. 政府采购合同与企业数据匹配

本文在对供应商名称进行初步清洗后,利用文本分析将政府采购合同与中国工商注册企业数据库进行匹配,并利用“天眼查”企业信息查询平台进行补缺与核查,以获取各供应商基本注册信息。通过人工校对的方式汇总匹配结果,政府采购合同与企业数据的最终匹配度在95%以上。进一步,利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将政府采购合同数据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精准匹配。考虑到上市公司存在较多子公司参与政府采购的招投标,本文手工整理了上市企业母、子公司名称,将其与政府采购合同数据匹配,并将两部分结果合并。在剔除关键信息缺失样本后,最终保留的有效样本中共有1129家上市企业。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进行了如下样本处理:(1)剔除未纳入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范围的地区样本;(2)剔除存在关键数据缺失的政府采购合同样本、企业样本;(3)为避免极端值影响,对各连续变量进行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以检验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C_{i,t} = \alpha_0 + \alpha_1 Proc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_j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表示城市, t 表示年份;解释变量 $Proc_{i,t}$ 设定为 i 市 t 年所发布的政府采购金额总量;被解释变量 $C_{i,t}$ 为消费支出的代理变量,此处本文主要使用“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_{all})”“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_{city})”“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C_{rural})”三个变量; λ_j 为省级地区固定效应, δ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X_{i,t}$ 为控制变量。借鉴薛熠等(2023)、邓慧慧等(2024)的研究,控制变量 $X_{i,t}$ 的选取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的对数(gdp)表示;(2)人口规模,以年末总人口的对数($people$)表示;(3)金融发展水平,以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占GDP的比重(fin)表示;(4)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cindus2$)、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cindus3$)表示;(5)教育水平,以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的对数(stu)表示;(6)社会保障水平,以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ins)表示。描述性统计结果见线上附录1。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1第(1)~(3)列分别汇报了政府采购对全体居民、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政府采购($Proc$)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从经济显著性来看,政府采购规模变动1个标准差会导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上升5.97%($0.0046 \times 4.1933 / 0.3232$)^②个标准差;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上升4.87%($0.0029 \times 4.1933 / 0.2498$)个标准差,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上升5.93%($0.0042 \times 4.1933 / 0.2970$)个标准差,具有较强的经济显著性。总体来说,政府采购能够提振居民消费,支持了研究假说。

① 由于部分地区缺少关于“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本文利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常住城镇、农村人口等指标,对“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测算。

② 借鉴游家兴等(2023)研究,本文经济显著性的计算方法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解释变量的标准差)/被解释变量的标准差。

表 1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变量	(1)	(2)	(3)
	<i>C_all</i>	<i>C_city</i>	<i>C_rural</i>
<i>Proc</i>	0.0046*** (3.72)	0.0029*** (2.85)	0.0042*** (3.28)
<i>gdp</i>	0.3673*** (27.28)	0.2825*** (25.20)	0.2236*** (20.27)
<i>people</i>	0.0595*** (3.35)	0.0294*** (3.11)	0.0220** (2.16)
<i>fin</i>	-0.0190 (-0.86)	0.0207 (1.08)	0.0193 (0.81)
<i>cindus2</i>	0.2007** (2.27)	0.1989*** (3.45)	-0.2076 (-1.58)
<i>cindus3</i>	-0.0082 (-0.09)	0.1231** (2.18)	-0.3601*** (-2.70)
<i>stu</i>	0.0247 (1.18)	0.0071 (0.39)	-0.0211 (-0.93)
<i>ins</i>	0.1707*** (5.36)	0.1576*** (6.11)	0.1970*** (7.74)
常数项	5.5615*** (21.94)	6.5771*** (34.42)	7.2874*** (31.29)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N</i>	1248	1248	1248
调整 <i>R</i> ²	0.8874	0.8403	0.8484

注：(1)回归采用稳健估计(robust)；(2)***、**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下同。

(二)非线性关系分析

为探究政府采购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是否将挤出“居民消费”，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二次项，考察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借鉴Lind和Mehlum(2010)的研究，采用更为严谨的U-test，弥补仅依靠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系数进行非线性关系判断的不足，其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在关于全体居民、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回归中，政府采购规模二次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其U-test结果得出的极值点均不在数据范围内，无法拒绝原假设。同时，关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U-test的*p*值大于10%，无法拒绝原假设。故政府采购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不存在U型或倒U型关系。

表 2
 非线性关系检验

变量	(1)	(2)	(3)
	<i>C_all</i>	<i>C_city</i>	<i>C_rural</i>
<i>Proc</i>	0.0058*** (3.99)	0.0038*** (3.45)	0.0036** (2.55)
<i>Proc</i> ²	0.0005** (2.17)	0.0004** (2.08)	-0.0002 (-1.00)

续表 2

变量	(1)		(2)		(3)	
	<i>C_all</i>		<i>C_city</i>		<i>C_rural</i>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i>N</i>	1248		1248		1248	
调整 <i>R</i> ²	0.8878		0.8407		0.8484	
拐点阈值	-6.1382		-4.9506		8.1583	
<i>Interval</i>	0	14.7540	0	14.7540	0	14.7540
<i>Slope</i>	0.0102	0.0219	0.0072	0.0147	0.0062	0.0010
Overall test					t-test	p
					0.40	0.3450

注:(1)Overall test 汇报了最终检验结果,如果 *p* 统计量小于 10%,则拒绝原假设;反之,则接受原假设。(2)由于有关 *C_all* 和 *C_city* 的 U-test 中其拐点阈值不在数据取值范围内,无法拒绝原假设,故未汇报 Overall test 结果。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①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了对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间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评估,避免核心变量衡量带来的估计偏差。首先,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全体居民消费总量、城镇居民消费总量以及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其次,基于 2016 年、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家庭消费总量”指标作为居民消费的替代变量进行检验。上述结果均稳健。

2. 工具变量法

为缓解反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的做法,以“街道办事处数量”为工具变量进行检验。在相关性方面,通常城市内的街道办事处数量越多,其采购需求相应增加,故街道办事处数量正向影响政府采购规模。在外生性方面,街道办事处数量主要受行政区域面积等自然因素、行政区划设置等历史传统的影响,与居民消费行为不存在直接关联(黄继承、朱光顺,2023)。其结果表明在以工具变量控制相关内生性问题之后,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3. 非线性关系的补充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非线性关系不存在”的原因是“挤出效应”不存在,还是“挤出效应”对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间关系的影响较小。首先,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地方税收收入”以论证“挤出效应”是否存在。其次,借鉴刘贯春等(2021)的做法,使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地区 GDP”作为地方财政压力的衡量指标;借鉴李燕和王晓(2016)做法测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②。检验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存在一定“挤出效应”,但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当地财政压力,从而削弱“挤出”效应。

4.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用以下五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替换解释变量。使用当地政府发布的采购合

^① 篇幅所限,未在正文中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案。

^② 受篇幅限制,“财政支出效率”指标测算方法详见线上附录。

同总数衡量政府采购规模。(2)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为避免潜在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本文将标准误聚类至地级市层面进行处理。(3)排除时滞效应。通过将被解释变量前置一期、解释变量替换为“截至前一期累计的政府采购金额”,以排除时滞效应影响。(4)异地采购效应。本文以供应商所在地区为基准,汇总当地承接的政府采购金额,考察当地承接的政府采购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影响。(5)排除“年底突击花钱”问题。构建“第四季度每月政府采购支出平均值减去前三个季度平均值”作为“年底突击花钱”的代理变量,并引入原模型作为控制变量。上述结果均稳健。

(四)异质性分析^①

1. 居民收入特征的异质性

政府采购能否发挥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居民自身收入特征的影响。本文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高于中位数的为高收入地区,反之为低收入地区。回归结果显示,^②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高收入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而在低收入组的回归中,政府采购仅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其原因或许在于:城镇居民在消费上更加注重品质和个性化需求,而处于低收入组地区的政府,其可支配财力相对较低,政府采购往往难以直接满足这些需求。同时,低收入组农村居民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而政府采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公众提供如教育、养老、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减轻了低收入组农村居民的服务性消费负担,从而释放出更多的消费潜力。

2.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在政府采购的执行过程中,需要妥善处理不同规模企业公平参与竞争的问题。基于企业工商注册资本数据,本文将各地区供应商企业按照规模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三类。其中,划定注册资本在0~100万元(含)的企业为小型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500万元(含)的为中型企业;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为大型企业。由回归结果可知,^③相较于大型企业,由中小型企业所获得政府采购对当地居民消费的影响更大。其原因在于,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型企业整体经济发展环境中处于劣势,而政府采购能够保障中小型企业公平竞争机会。同时,中小型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对于保障居民社会福利、创造就业、稳定经济运行以及优化国民经济结构布局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张一林等,2019)。因此,由中小型企业获取的政府采购订单更容易贯彻政府宏观经济调节意图,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3. 区域的异质性

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差异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居民消费观念,也影响着其对政府的依赖程度。因此,具体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影响效果显得尤为必要。附表5报告了政府采购对各地区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影响。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而对中部地区居民消费、西部地区的全体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区域,市场经济更加繁荣,政府采购对于居民消费的正面影响能够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得以放大。与之对应地,西部农村地区经济实力不强、市场化程度较低,居民对政府依赖程度较高(陈志勇、陈思霞,2014),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更为明显。

^① 异质性检验结果详见线上附录。同时,本文线上附录附表6、附表7中汇报了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的异质性检验、不同内容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异质性检验,但两组结果均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② 见线上附录附表3。

^③ 见线上附录附表4。

五、机制分析^①

(一)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需求侧的影响效应^②

受现有数据制约,难以明确检验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为此本文选取“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_all*)”“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_city*)”“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ncome_rural*)”作为机制变量,据以简要考察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挤入”“挤出”效应的叠加效果。同时,本文引入机制变量与政府采购规模的交乘项,以反映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其可行性在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可近似表达为居民消费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微分,若将式(2)对居民可支配收入进行微分,政府采购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交乘项系数恰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政府采购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C = \alpha_1 Proc + \beta_1 Income + \beta_2 Proc \times Income \quad (2)$$

线上附录附表8第(1)、(3)、(5)列检验了政府采购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政府采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呈现显著“挤入”效应,从而对居民消费形成强大的正向激励。附表8第(2)、(4)、(6)列回归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全体居民以及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而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或许在于:农村居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机会和渠道少于城镇居民,并且农村的节俭消费观使农村居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大于边际消费倾向(李锐,2003),制约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综上所述,政府采购能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假说1与假说2得以验证。

(二)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的影响效应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居民消费外溢的原因在于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提升,致使产品供给质量不高,难以满足消费者对消费品转型升级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1)。因此,为检验政府采购对产品供给质量的影响,本文选取地级市专利申请量(*Patent*)与专利授权量(*Grant*)作为供给质量的代理指标,并进一步引入专利申请量、授权量与政府采购的交乘项进行调节效应分析。^③相应回归结果如线上附录附表9第(1)~(4)列所示。其中,第(1)、(3)列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增加地级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进而提高供给质量,以满足居民消费的多元化需求;第(2)、(4)列回归结果不仅证实了选取专利申请与授权量作为中介变量的合理性,还表明供给质量提高对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假说3得以验证。

(三)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的溢出效应

现有研究表明,政府采购规模巨大且多数流向了企业,为企业带来规模可观且风险较小的

^① 篇幅所限,回归结果详见线上附录附表8和附表9。

^②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府采购对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其结果并不显著,其原因或许在于: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反映了居民在收入增加时消费行为的变化,而平均消费倾向则反映居民的长期消费水平。虽然政府采购可能提升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使得他们在面对短期收入增加时愿意消费更多。然而,平均消费倾向更多受居民的持久收入、消费习惯等长期因素的影响,故政府采购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短期影响可能并不明显。同时,由于本文数据区间(2015—2019年)较短,难以检验出政府采购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影响的长期效果,这或是文章未来的拓展方向。

^③ 由于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难以区别其属于城镇或农村专利,此处本文仅考察供给质量对政府采购与“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之间关系是否具有调节作用。

经济效益,有助于激励在位企业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劳动者收入(张国胜、吴晶,2019)。由此,政府采购产生的溢出效应能够促进居民消费扩张。本文在此引入地级市“在岗职工平均人数(*Labor*)”“在岗职工平均工资(*Wage*)”,以检验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影响的溢出效应,回归结果见附表9第(5)~(8)列。其中,第(5)、(7)列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就业机会与平均工资水平,从而提振居民消费;第(6)、(8)列回归结果证明,就业机会、工资水平对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强化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假说4得以验证。

六、进一步分析^①

(一)政府采购对国内产品消费的影响检验^②

现有数据表明我国虽拥有较大的消费市场,但居民消费外溢问题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完整内需体系的培育。而政府采购的“市场性”特征,能够促使企业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填补“供给缺口”,缓解需求外溢。然而,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无法直接检验政府采购对内需的影响。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货物进口总额(*Import*)”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据以检验排除消费外溢影响后,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同时,基于调节效应理念,引入“政府采购规模”与“货物进口总额”的交乘项,以更明确地识别政府采购对扩大“内需”的影响情况。其回归结果如线上附录附表10所示。附表10第(1)、(3)、(5)列显示,政府采购规模对居民消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说明控制“消费外溢”现象的影响后,政府采购仍能够提振居民消费。第(2)、(4)列的交乘项系数并不显著,即货物进口总额对政府采购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第(6)列回归结果显示“政府采购规模”与“货物进口总额”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商品进口弱化了政府采购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需求价格弹性相对较高,因此当高价进口商品涌入时,农村居民可能将减少其消费支出。综上所述,进口额并不能强化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关系,该结果或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政府采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本国产品的消费,释放我国内需潜力,推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二)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侧的微观效应检验

上文机制分析中探讨了政府采购对市级层面上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但受制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难以运用地级市层面的宏观数据,考察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预期的影响。因此,为进一步检验假说2,本文借鉴李树和于文超(2020)的做法,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对本县市政府评价(*Emg_family*)”^③“受访者的未来预期(*Fid_family*)”指标,刻画政府采购能否提高政府公信力,促使民众产生良好经济预期。此外,为进一步研究政府采购对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挤入”效应,本文选取“受访者家庭收入(*Income_family*)”“受访者人均家庭收入

① 与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政府采购的总量和占比偏低。在此背景下,是否需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规模与比例有待考察。本文线上附录附表11中汇报了政府采购对财政支出乘数的影响,并引入“政府采购规模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Ratio1*)”“政府采购规模占GDP的比重(*Ratio2*)”,据以考察政府采购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其结果表明,政府采购比例越高越能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即我国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但仍有巨大的潜在规模有待进一步挖掘。

② 篇幅所限,政府采购对国内产品消费的影响检验结果详见线上附录附表10。

③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中“对本县市政府的评价”指标被分为“有很大成绩、有一定成绩、没有多大成绩、没有成绩、比之前更糟了”五个维度,“1”表示“有很大成绩”,以此类推“5”表示“比之前更糟了”,数字越大代表居民对本地政府的评价越低。

(*Income_per*)”指标,探究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的微观机制,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第(1)、(2)列结果与前文机制检验保持一致,即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受访者的家庭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第(3)、(4)列结果表明,扩大政府采购规模能够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主观感受以及对自己的未来预期,验证了政府采购能够促使居民产生良好预期,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表3 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需求侧的微观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i>Income_family</i>	<i>Income_per</i>	<i>Emg_family</i>	<i>Fid_family</i>
<i>Proc</i>	0.0120*** (2.72)	0.0112*** (2.71)	-0.0023** (-2.20)	0.0009** (2.31)
地区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个体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i>N</i>	15772	15772	15412	15787
调整 R^2	0.2686	0.3264	0.0583	0.0762

(三)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为佐证前文结论,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角度进一步考察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供给侧的影响,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如下:

$$I_{p,t} = \beta_0 + \beta_1 FProc_{p,t} + \beta_2 X_{p,t} + \eta_p + \delta_t + \varepsilon_{p,t} \quad (3)$$

其中, $FProc_{p,t}$ 表示 p 企业在 t 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总额与企业总资产之比。 $I_{p,t}$ 为企业创新水平,本文选用上市公司“创新投入(*R&D_firm*)”“专利申请量(*Patent_firm*)”衡量政府采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同时,为检验假说4,本文选用上市公司“雇佣规模(*Labor_firm*)”“企业平均工资(*Wage_firm*)”指标,考察政府采购对企业雇佣规模与工资水平的影响。此处, η_p 为企业固定效应, δ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X_{p,t}$ 为控制变量。在控制变量 $X_{p,t}$ 的选取方面,此处本文主要控制了包括企业年龄(*age*)、流动资产总额(*ca*)、固定资产净额(*ppe*)、企业负债(*debts*)、所有者权益(*equity*)、营业成本(*cost*)、销售费用(*selling*)、存货收入比(*iir*)、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董事会规模(*board*)等企业层面特征。如表4第(1)、(2)列结果所示,政府采购政策能够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说明政府采购规模大、周期长、价值高等优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企业创新的难题,从而提高企业供给质量。表4第(3)、(4)列结果证明政府采购对企业雇佣规模与工资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从微观企业层面上进一步验证了假说3与假说4。

(四) 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衔接的效应检验

至此,本文已探讨了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具体而言,从需求侧来看,政府采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与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提振居民消费;从供给侧来看,政府采购能够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提高企业供给质量,同时政府采购能够给企业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推动企业提高雇佣规模与工资水平,激励居民消费。但企业为满足政府公共需求所开展的技术创新能否满足居民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即企业为满足政府采购需求所“提高的供给质量”是否契合居民需求,政府采购能否促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衔接?一方面,政府采购的

“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其作为公共消费的一部分,对全社会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有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导居民消费动向。另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质量进行背书,缓解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窦超等,2020),提高居民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可能,使得供应商企业能够在满足政府采购需求的同时,契合居民消费需求,实现“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衔接。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主营业务收入^①——企业当年所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额”测算企业的产品转化能力,用以检验企业产品或服务除销售给政府外,能否进一步销售给其他消费主体,满足其他消费主体需求。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第(5)~(8)列所示。表中第(5)列报告了政府采购规模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影响效应,其结果显示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主营业务收入(*Sale_firm*),为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提供支撑。第(7)列检验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提升企业的产品转化能力(*Pcr_firm*),即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有效衔接。进一步,考虑到企业的创新决策与收益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将*Sale*、*Pcr*前置一期,其结果汇报于第(6)、(8)列。政府采购仍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销售收入与产品转化能力,且估计系数及其显著性均有所提高,支持前文所得结论。

表4 政府采购影响居民消费供给侧的微观效应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7)	(8)
	<i>R&D_firm</i>	<i>Patent_firm</i>	<i>Labor_firm</i>	<i>Wage_firm</i>	<i>Sale_firm</i>	<i>F.Sale_firm</i>	<i>Pcr_firm</i>	<i>F.Pcr_firm</i>
<i>FProc</i>	0.1418** (2.29)	0.0046* (1.71)	0.0087** (2.27)	0.0118* (1.74)	0.0085* (1.83)	0.0126** (2.12)	0.0086** (1.98)	0.0128** (2.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069	1832	2352	2346	2351	1207	2350	1207
调整 <i>R</i> ²	0.9628		0.9652	0.9293	0.9681	0.9807	0.9684	0.9812

注:考虑到企业层面的专利申请量(*Patent_firm*)存在较多0值,为此,本文参考吕越等(2023)的做法,采用更符合专利数据特征的泊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控制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

七、结论与启示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明确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战略部署。当前,我国虽拥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但居民消费需求较低,且现有供给能力难以满足居民多元化消费需求,导致居民消费存在“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双向不足”问题。为探究实现有效需求与有效供给对接、转化的关键节点,本文基于政府采购这一具有“公共性”“市场性”双重特性的公共消费,探讨政府采购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

通过上文实证研究发现:(1)政府采购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在进行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挤入”居民

① 此处使用新产品销售收入更能体现企业提高供给质量的结果,但上市公司年报未披露新产品销售收入数据,故本文于此使用“主营业务收入”指标,若数据可获得,这可成为本文在未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工资,从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政府采购对收入水平较高地区居民消费、低收入地区农村居民的影响较强;由中小型企业所获得的政府采购项目更能够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政府采购对市场机制较为完善的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对政府依赖程度较高的西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影响。(4)本文通过构建“企业产品转化能力”指标,探究政府采购能否促进企业在满足政府需求的同时满足其他消费主体的需求,其检验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居民消费“需求侧”与“供给侧”有效衔接。综上所述,本文的分析结果可能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优化政府采购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在扩大内需中的引导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市场性”作用,在不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的情况下,适度引导消费需求,改善产品质量。同时,完善政府采购信息公开机制,建立透明公开的政府采购平台,提供详细的采购指南、招标文件和评审标准,确保供应商能够公平竞争,缓解居民在消费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完善政府采购标准,在需求层面引导居民消费模式变革。研究并设立创新、绿色的采购标准,鼓励政府采购环保、节能、低碳以及可再生资源利用等方面的产品和服务,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公共性”作用,激励更多的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创新或绿色采购,推动居民消费模式的变革,激励绿色产品和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促进绿色产业链的形成与完善,推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充分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的扶持作用。通过优化政府采购的审批流程,降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门槛,鼓励更多的优质小型企业参与竞争,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同时,政府机构应优先选择创新型企业 and 环保型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促使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生态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志勇、陈思霞:《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投资冲动与财政预算软约束》,《经济研究》2014年第3期。
2. 邓慧慧、曾庆阁、张三峰、陈昊:《城市空间形态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财贸经济》2024年第7期。
3. 窦超、白学锦、陈晓:《政府背景大客户能否改善民企创新的“质”与“量”》,《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1期。
4. 杜莉、罗俊良:《房价上升如何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基于两阶段家庭最优消费模型的研究》,《财贸经济》2017年第3期。
5. 黄继承、朱光顺:《绿色发展的中国模式:政府采购与企业绿色创新》,《世界经济》2023年第11期。
6. 姜爱华、费堃桀:《政府采购、高管政府任职经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计研究》2021年第9期。
7. 李锐:《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量分析》,《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8. 李树、于文超:《幸福的社会网络效应——基于中国居民消费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20年第6期。
9. 李燕、王晓:《国家治理视角下我国地方财政透明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11期。
10. 刘贯春、叶永卫、张军:《社会保险缴费、企业流动性约束与稳就业——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5期。
11. 刘京焕、张霄、王宝顺:《我国政府采购政策经济功能研究》,《财政研究》2013年第2期。
12. 吕越、陈泳昌、张昊天等:《电商平台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兼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13. 潘彬、罗新星、徐选华:《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4. 邵明波、胡志平:《居民消费高质量增长机制:优化公共消费》,《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1期。
15. 孙早、许薛璐:《产业创新与消费升级: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的经验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7期。
16. 田利辉、关欣:《不确定性冲击下政府采购的价值效应》,《财贸经济》2023年第9期。
17. 王立国、赵婉妤:《产能过剩对信贷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改革》2019年第12期。

- 18.王伊攀、朱晓满:《政府采购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应研究》,《财政研究》2022年第1期。
- 19.王蕴、姜雪、李清彬等:《消费倾向的国际比较与促进中国消费倾向稳步提升的建议》,《宏观经济研究》2022年第3期。
- 20.武威、刘国平:《政府采购与经济发展:转型效应与协同效应——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财政研究》2021年第8期。
- 21.徐舒、张冰、王慧:《社保降费如何惠企利民:分担机制与缴费归宿》,《世界经济》2023年第7期。
- 22.薛熠、王韡、徐朝阳:《构建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收入不平等及其宏观经济效应》,《经济研究》2023年第7期。
- 23.阎坤、王进杰:《积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世界经济》2003年第4期。
- 24.杨方方、陈少威:《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发展困境与未来方向》,《财政研究》2014年第2期。
- 25.游家兴、林慧、柳颖:《旧貌换新颜: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绩——基于8227家银行支行的实证研究》,《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1期。
- 26.张国胜、吴晶:《中国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就业吗?——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发现》,《劳动经济研究》2019年第4期。
- 27.张一林、林毅夫、龚强:《企业规模、银行规模与最优银行业结构——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
- 28.赵福军:《政府采购过程中的行为分析》,《财贸经济》2007年第9期。
- 2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路径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21年第2期。
- 30.Bleda, M., & Chicot, J., The Role of Public Procurement in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for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107, No.2, 2020, pp.186–196.
- 31.Boehm, C. E.,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Purchases Affect the Multiplier? .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115, No.11, 2020, pp.80–93.
- 32.Bouakez, H., & Rebei, N., Why Does Private Consumption Rise after a Government Spending Shock.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40, No.3, 2007, pp.954–979.
- 33.Chen, W., L. Zhang, & Jiang, P., et al., C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Analysts' Prediction Behaviour. *Accounting & Finance*, Vol.62, No.2, 2021, pp.2543–2578.
- 34.Dawood, T.C., & Francois, J.N., Substitu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Government Consumption in African Economies. *Economic Modelling*, Vol.73, No.6, 2018, pp.129–139.
- 35.Feldstein, M., 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2, No.5, 1974, pp.905–926.
- 36.Goldman, J., Government as Customer of Last Resort: The Stabiliz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Purchases on Firm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33, No.2, 2020, pp.610–643.
- 37.Holden, S., & Sparrman, V., Do Government Purchases Affect Unemployment? . *Th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20, No.1, 2018, pp.124–158.
- 38.Lind, J. T., & Mehлум, H., With or without U? The Appropriate Test for A U-shaped Relationship.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72, No.1, 2010, pp.109–118.
- 39.Schmookler, J., Economic Sources of Inventive Activit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2, No.1, 1962, pp.1–20.
- 40.Wei, S., & Zhang, X.,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9, No.3, 2011, pp.511–564.

Can Public Consumption Lead to Resident Consumption

YAO Peng (Qufu Normal University, 276826)

WANG Yutong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100142)

Summary: Consumption serves as a direct indicator of people's pursuit of a better life, and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a comprehensive domestic demand system” remains a top priority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ll remain so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However, the current weak driving effect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on China's economy, coupled with the dual challenges of “insufficient effective

demand and inadequate effective supply” in residential consumption, has constrained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China’s domestic market potential, creating an urgent need to identify key mechanisms for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Previous studies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mostly adopt a unidimensional approach, failing to account for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demand-side and supply-side constrain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as a macroeconomic policy tool through its “public welfare” and “market-oriented” attributes, using panel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cities (2015–2019). We examine whether government procurement—via economic transactions—can stimulate household consumption, guide corporate innovation, bridge demand-supply gaps, and foster a robust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ignificantly enhances household consumption levels. The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rigorous tests, including variable substitution, nonlinearity checks,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analyse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on the demand side, government procurement “crowds in” household disposable income and increases marginal consumption propensity; on the supply side, it incentivizes corporate innovation to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meets diverse consumer needs, generates low-risk economic benefits for firms, and creates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rough spillover effects that raise wages, thereby boosting consump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esidents in high-income regions and Eastern regions, as well as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of rural residents in Western regions and low-income regions. Furthermore, procurement orders awarded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re more effective in enhancing residents' consumption levels. Procurement significantly impacts consumption in eastern regions where market mechanisms are mature and in rural western regions which depend highly on government support. Furthe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government procurement simultaneously meets public needs and aligns consumption demand with supply, achieving effective demand-supply integ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for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unleashing domestic demand,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Government Procurement, Residents’ Consumption, Willingness to Consume, Quality of Supply

JEL: D12, E62

责任编辑: 馨 兰